

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
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

柳立言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以北宋首都開封的城市生活爲題，作者旨在求「新」：新的研究領域、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寫作形式（卷前語），但評者的態度是舊式的：春秋責備賢者。

相信不少讀者都曾被 Jonathan D. Spence 的名著《The Death of Woman Wang》開頭那場天崩地坼的情景所震懾。這就是通俗歷史的一個優點，它讓作者在有限的史料上發揮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把空白填得充實，把靜態化爲動態，把平面變爲立體。然而，城市生活千頭萬緒，要在熙來攘往之中捕捉有意義的片段，就非有主題不可；例如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社會結構〉等一系列有關城市的論文，就是主題明確、引人入勝的成功作品。

反觀本書，很明顯缺乏主題。就整個佈局來看，作者是用心的。從〈樊樓燈火〉開始，作者有層次地帶領我們走過開封甚至臨安的大街小巷，用白話引述著《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和《都城紀勝》等著作，一直到了〈沒有被遺忘的角落〉，真的是五光十色，可惜也是走馬看花。

首先引起疑問的是城市的代表性。正如作者所說，除了東京

開封外，還有西京洛陽、北京大名、和南京應天。開封雖為首都，但論文化水平、戰略地位、或社會建設，並全不勝於三京或其他城市，而北方的生活也不盡同於南方。掌握個別城市的特色，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分類介紹，才不會失於片面。作者把城市粗分為政治與經濟兩大類(頁6)，是失諸籠統的。

其次是城市的歷史。開封的繁盛非始於宋，其衰落卻因靖康之禍，但讀者完全看不到這轉變的前後。除此之外，開封的歷史不乏關鍵性的時刻可寫成故事的高潮。其一是陳橋兵變後太祖嚴禁夯市，不但保存了開封的元氣，更象徵著新時代的來臨；其二是澶淵之盟後的極度繁榮；其三是仁宗時的百病叢生；其四是王安石變法後的再創高峰；最後就是樂極生悲了。這樣寫來才似長卷，不像現在的獨幕劇，時、地、空均不明顯。

第三是宋代的特色。的確，生活是長時段的歷史，不容易覺察其變化。在一些項目，如商業手法(頁37~39, 60~61)、交通工具(頁66~78)、租賃服務(頁68~70)、男女組合(頁223~244)、和社會救濟(頁269~277)等，作者都能點出時代的特徵，這是本書最成功的地方，可惜的是沒有參考書目可以方便讀者進一步探索。另方面，一些章節卻沒有宋代的特色，如〈快節奏的歡愉〉(頁193~207)，作者以為「宋代節日的兩大特色是：時序性節日的娛樂化，宗教性節日的商業化。」又如〈黑道〉(頁259~268)，作者以為「宋代黑道的作案水平，從一個陰暗的側面反映了社會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的上升。」但評者實在無法找出所謂「特色」的充分證據。

作者有時卻輕易放過了一些足以反映時代轉變的社會現象。例如對社會流動頻仍下職業的多變和身分的提高，已有不少的研

究成果，作者在社會職業（頁47）也略有提及，卻沒有深入。又如教育普及，造就了衆多的在野知識分子，但作者在〈走入社會之前〉（頁120～135）只簡單勾劃了學校的制度，完全忽略了官學生的生活和政治運動（如靖康之難前的投入和與南宋權相的離合）及書院師生對理想的執著（如在政治思想上以道統自居以對抗政統，在社會行為上別樹一格而被稱為道學家）等。又如司法制度的長足進步，作者只有五百字左右（頁100）的介紹，其實只須一翻《名公書判清明集》，就可寫出生動有趣的官司，順便介紹宋代的訟學，這些都已有不少專著可以綜合引用。又如〈敬神與造神〉（頁136～153），可以介紹宋代抑巫揚醫的努力和媽祖信仰的形成；〈市民愛憎的抒發〉（頁180～192）可介紹民間文學對時事的諷刺，耳熟能詳的如「拗相公」的直斥王安石等，龐德新先生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從話本及擬話本所見之宋代兩京市民生活》有甚多資料。最後，無論鄉村生活或城市生活都脫離不了家庭或家族，何況宋代一直被認為是近世家族型態的肇始。除了十多種家訓家規外，袁采的《袁氏世範》就提供了不少家庭（族）生活的消息，而大陸學者王玉波先生的《中國家長制家庭制度史》（1989）和徐揚杰先生的《中國家族制度史》（1992）都有不少宋代的資料。

作者有時會把我們帶到與城市生活無直接關係的地方，以乙編最為明顯。〈最顯赫的家族〉談的是帝皇佚事，〈高超的平衡遊戲〉談的是政治運作，而〈後宮微瀾〉談的是后妃際遇，大都看不出與「城市生活」何關；我們不能因為皇宮在城市中便將這些稱為城市生活。作者也嘗試把城市與皇宮連接起來，例如說：「宋代大潮式的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風尚的變化，不可能不滲透到皇宮裡來。……而商品競爭的原則是非暴力的。宋代後宮生

活中的爭鬥，揉合了暴力的與非暴力的方式，但總的傾向是非暴力的，因而能保持相對平靜的局面。」（頁115）這是十分牽強的揉合。又例如說：「宋代社會變化發展的大潮並沒有繞過森嚴的皇宮，……最深刻的變化是后妃的階級出身結構，……出身低微的，甚至低微得無從考稽其家庭的，比比皆是。」（頁107）事實上大部分出身低微的后妃在入宮時只屬於執役的階層，實緣得幸而貴，至於正式的選妃，主要是向上層文武官員徵選的。

還有一些分析也是不容易理解的，例如說：「大酒店的經營結構，有三個主要部分：一是表層部分，食品銷售部門，……二是中層部分，食品加工部門，……三是深層部分，釀酒生產部門，……。」（頁29～30）評者不明白為什麼釀酒是屬於「深層」，也不明白為什麼要用「表層、中層、深層」這些字眼。作者又說：「人口密集的城市，才是真正的神道信仰中心。」（頁137）評者不明白為什麼人口更多的鄉村就不是「真正的」神道信仰中心。作者又說：「西漢，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耕地43畝，折成今畝約30畝。北宋每個勞力耕地17.8畝，折成今畝約16畝。可見，宋代勞力平均耕種面積比漢代減少將近一半。……從總體看，擁有一定閑暇的中下層市民畢竟多了起來。」（頁168～169）評者不明白耕田與城市生活何關，也不明白在宋代不立田制的情況下耕地被兼併以致乏田可耕的貧農怎會屬於「閑暇的中下層市民」。類似的推論還有不少（如頁136「當人們把自己束縛於……阻止群眾的覺醒。」頁142～143「所謂修心，……封建統治。」頁153「門神與灶神，……客觀要求的反映。」頁219「南宋孝宗……一種病變。」），而不加說明的史料堆垛就更多（如頁23，25～26，34～35，105～106，143，169～170，178，181等）。

綜合而言，評者有三點感想。第一，本書讓讀者看到一幕一

幕的景象，卻欠缺了明確的主題和深入的分析，結果只收到浮光掠影的效果，反不如《清明上河圖》來得真切生動。

第二，本書清楚透露一個問題，就是一部全面和上乘的社會史不是任何一位作者所能獨力完成的。研究交通(行)的專家能夠兼顧服飾(衣)所傳達的美感觀念嗎？研究家居(住)的專家能兼顧口味(食)嗎？明顯可見，本書的作者已盡了不少的努力，但其效不彰，我們應先進行更多的主題研究，更多參考別人的成果，再作綜合。

第三，通俗不等於顯淺，假如大眾讀物還是停留在籠統和流水帳的層次，那麼學界與社會的距離只會愈來愈遠，也難怪會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對社會大眾，學人除了灌輸知識外，更應該注意「啓發」和「方法」；知識是會忘記和過時的，「思」「路」才是受用不盡的。